

宋子文研究系列

宋子文

思想研究

● 吴景平 著



SONG ZIWEN SIXIANG YANJIU



宋子文

思想研究

 吴景平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宋子文思想研究

SONGZIWEN SIXIANG YANJIU

“宋子文研究”系列

， 吴景平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厂址:福州市塔头街 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625 印张 25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1-02894-7

D·216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宋子文有思想吗？值得进行专门研究吗？”

多年前，一位朋友得知我准备撰写有关宋子文思想的著作，便提出了以上问题。我想，这也是有兴趣翻阅本书稿的读者首先想知道的。

的确，宋子文谈不上是思想家。最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应对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有着系统而详尽的论述，亦即哲学家。此外，研究社会特定领域的学者，如经济学家、财政学家、金融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等，也被称作专门思想家。

宋子文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此外，严格说来，宋子文也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专门思想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就学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较多地了解、接受了近代西方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但在返国后数十年的政坛生涯里，宋子文并未就某一领域有过持之以恒的学理性研究，也罕见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性著述存世。此外，宋子文也不热衷于演讲，没有留下大量相关联的演讲稿可资证明他有着系统、全面的学理性思考。

但是，宋子文不是思想家，并不等于他没有思想。本书稿是从较为广泛的含义上来使用“思想”一词的。任何有健全思维能

力的人，对于有较多接触的事物均会形成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便属于广义的思想。就宋子文而言，他的重大经历是与国民政府的历史（包括广州、武汉和南京三个时期）密切相联的。他是广州、武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主持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出任过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和院长；在地方性政权机构中，他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商务厅长、财政厅长、广东省主席、广州各属行政专员、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务。此外，宋子文是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一度还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这些经历，使得宋子文对于社会经济、财政、金融、外交和政治等领域的问题，较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本书便是从这几个方面分别阐述宋子文的思想。

研究宋子文的思想，首先是全面研究宋子文这个人物的需要。要对宋子文独特的政坛生涯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不仅要搞清他的主要经历、交往、对重大决策的参与和历史事件的介入情况，还应了解宋子文相应的观点和主张，看看他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发挥其作用的。

其次，对宋子文的思想资料作较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民政府史的研究。宋子文长期置身于国民党中央决策层，他的思想无疑属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宋子文的不少观点和主张，是对国民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过程的直接反映，虽然并非都是全面的反映。而他的观点和主张，也并非与其他国民党政要的看法完全一致。研究这些观点和主张，显然可使我们对国民政府运作的考察，由表象而进入深层。例如，对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实施的若干政策，如关税自主、盐务整理、裁厘改统、金融统制、废两改元，等等，了解并分析

宋子文的相应观点和主张，将使有关的专题研究避免简单化、公式化。

再次，研究宋子文的思想，还将拓宽对民国时期若干专门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宋子文不是专门思想家，他对某些专门领域问题的论述，就其体系的完整、严谨，学理的精深，显然比不上当时若干著名学者达到的水准，如马寅初的经济学说、贾士毅的财政学说、杨荫溥的金融理论、张忠绂的外交理论；在政治学说方面，无论孙中山还是戴季陶、胡汉民的思想主张，都是宋子文难以企及的。但是，宋子文的有关观点和主张，有其独特的出发点、视角、思想逻辑，以及十分鲜明的致用性。而专门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以各学派系统的学说、理论为对象，还需要研究参与相关领域实际运作的主要角色的观点与主张，即便有时只是较简单的看法。进而言之，一部完整的专门思想史理应涵盖社会各阶层对相关领域问题的代表性认识，惟有如此，才能较全面地概括与评价人们对该领域规律性的认识。

至于研究宋子文思想的方法，除了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物思想研究的基本原则之外，还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宋子文的家庭环境和求学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宋子文出身于一个有较多近代文明素养和充满民主精神的家庭。他的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都可视为当时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之列，他们并以这方面的知识和思想去教育、培养子女。宋子文先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为圣约翰书院），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1912年，宋子文负笈留美，先进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的哈佛大学，主修经济；1915年从哈佛毕业后，又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直到1917年，宋子文才离美回国。宋子文接受的典型的近代西方教育，无论对他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还是政治见解，都有着较大

的影响。

二、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对宋子文思想的影响。在宋子文所处的年代里，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是多方面的，这些发展与变迁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都有着程度不等的影响。但就对宋子文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近代化的进程和政治结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就前者而言，不仅在社会生产与流通环节，而且在财政与金融领域，近代化的必要性、近代化进程的曲折性，直接导致宋子文关于发展社会经济、实行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的观点和主张的形成。而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及分裂，也使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权重要成员之一的宋子文的政治主张，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三、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变迁对宋子文思想的影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成为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被迫承受者；但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为摆脱旧有国际秩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抗争也没有终止过。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不但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在社会思想领域有着更显著、更重要的地位，而且这种意识有着较为突出的普遍性，往往较易逾越阶级、地位的局限而为广大社会公众所接受。尤其应当指出，本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反而进一步促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全民族的觉醒不仅体现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之中，而且还反映在中国为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平等新约、争取应有国际地位的外交努力中，甚至还使得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构架国际新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建设性作用。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方面的惨痛历史以及所发生的变迁，对宋子文有关思想主张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而且主要是积极的作用。

当然，联系上述诸项因素对宋子文思想进行研究，也要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大致相同的外在环境和社会条件，对不同社会成员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对同一社会成员的不同时期、阶段，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较具体地分析各种情况下的共性与个性，是研究宋子文的思想时不可忽视的原则。

还应当指出，本书在叙述宋子文的观点和主张时，涉及到不少专业术语。因全书篇幅所限，对这些术语一般未作专门注释。

目 录

引 言	(1)
一 经济思想	(1)
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观点	(2)
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	(16)
西北开发论	(31)
统制经济论	(40)
对外开放论	(56)
二 财政思想	(77)
关于统一财政的主张	(78)
预算论	(95)
税收通论	(111)
关税自主及改革论	(123)
整理盐务论	(138)
裁厘开统论	(159)
理债与借债的观点	(172)
三 金融思想	(193)
金融机构统制论	(195)
货币改革论	(213)

四 外交思想	(241)
对日强硬论.....	(242)
寻求外援论.....	(261)
关于设立联合国的主张.....	(290)
关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观点.....	(298)
五 政治思想	(313)
结 束 语	(327)
主要参考资料	(329)
后 记	(331)

一 经济思想

宋子文有没有经济思想？进而言之，宋子文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对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是否提出过较系统的观点和主张呢？

作为国民政府时期最著名的理财家、地位最高的金融家，宋子文最为注重、谈论较多的无疑是财政和金融问题。即使他以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的身份所发表的言论中，也较多涉及到当时中国的财政与金融。近几年来学术界在研究宋子文时，较为关注的也是宋氏对于财政金融的论述。

然而，应当指出，从本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后期，宋子文对于社会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及相关问题，提出过不少的观点和主张。宋子文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与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与发展社会经济直接相关的职位，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在 20 年代担任广东省商务厅长期间，他的职责范围便涉及到主要商品的生产与供给，包括农、林、渔、副、矿、工、运输、仓储等诸多行业。又如，在 30 年代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期间，直接职掌关于国家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的设计及审定、各项计划应需经费的核定、计划的监督指导、特定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的直接实施等事项。^①

^① 参见《修正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1933 年 9 月 23 日），《国民政府公报》，第 1244 号，第 1 页。

全国经济委员会设有农业、水利、工程、公路、卫生实验等处和丝业改良、棉业统制等专门委员会。再如，抗日战争结束后设立并由宋子文任委员长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其职权范围涉及到经济资源利用、经济政策决定、经济计划制定、经济工作考核等重要方面。^①他在这类机构的任职，使他有可能较多地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并且必须直接处理相关问题。

还应当看到，无论政府财政还是金融，都离不开社会经济。例如，各项国税收入，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经济领域、经济活动；金融运作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无论作为财政部长还是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都必须对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思考。

而当宋子文以行政院代理院长、院长的身份活跃于政坛的时候，他所关注的除了经济问题外，还大量地涉及到经济与政治、军事、外交之间的诸多关系。

宋子文曾对社会经济的许多问题发表过言论，但从遗留的资料来看，他只对某几方面的问题提出过较系统的观点和主张。了解、分析这些观点和主张，也就是研究宋子文经济思想的主体部分；同时，对于研究和评价国民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观点

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后期，宋子文曾多次发表过应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言论。

^① 《最高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1945年11月26日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见《大公报》，1945年11月27日。

在广东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这方面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广东商务厅的《商务行政计划书》中。这份计划书系由宋子文以广东商务厅厅长的名义发表，最初刊于1925年7月29、30、3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稍作文字修订后，又于同年8月12日正式呈报广州国民政府。当时，广东地区已全面爆发省港大罢工，对英国实行经济绝交；英国则凭藉其在华种种特权及势力，对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因此，在国民政府所辖地区里，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商务行政报告书》实际上是任职才一个月的宋子文，对于解决广东社会经济困难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和设想。

宋子文认为，中国商务疲困、实业衰弱，国民政府在广东省政府内设商务厅，就是为了提倡维护、挽回补救；而英国对广东方面进行经济封锁后，导致“市面金融首受影响”，加上“必需品向未储备，民间食用尤起恐慌”。^①因此，当时广东地区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便是确保有关国计民生最基本用品的供给。宋子文相应提出了下列各点。

一、在粮食供应方面，奖励和保护米商从外省运粮入粤，解决不敷供应、米价腾贵的困境，同时采取措施，增加广东农业产量。他提出应“奖励各商源源输入，政府担任保护”，这样，米价也得以平抑；另对于侨商公司专运米面来粤接济，也允立案保护。宋子文指出：“盖米价既平，而政府又保护其输入，奖励其来源，则本省民食自不致有匮乏之虞。”^②宋子文也认识到，作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产粮“供不敷求，全恃外来接济”，这种状况应设法改变。为此，他提出了增加广东农业产量的若干措施，建议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4～115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5页。

研究其可行性：仿行湖南，试行禾稻每年三熟制；利用瓦斯促进农产；改良种子；肥料合宜；防阻病虫；农事试验场。总之，“务使本省尽其地力，农产加增，即一时不能免于仰给他方，亦冀其渐有可恃之进步。”^①

二、解决以煤为主的燃料问题。宋子文认为：“煤为交通上、实业上所必需之物”，应保证供给；其来源可为：“（甲）开辟来路；（乙）节制用途；（丙）特许输入。”为此，拟采取订租专备运煤船舶、到国内各矿购运等应急措施。但是，宋子文还看到：“欲求经济之独立，惟有自行开采，以图根本解决。”当时广东北江有私营煤矿，为促使其增产，宋认为除了应“责令该公司增加资本，修整机器大举开采”外，政府有关部门拟对该矿实行奖劝和保护措施，如减免税捐、核减运价、长期订约购用、选派军警保护。这样，“成本既轻，销路又广，而公司资产亦有保障，庶投资者可以踊跃矣”。^②

三、促进土丝输出。宋子文指出：土丝为广东输出大宗，每年进款达数千万元，对社会经济关系颇大。他提议采取以下措施：1. 设立出口土丝检查所，聘请外国缫丝专门技师从中检验，以增加国际贸易信用及推动直接输出；2. 设立蚕桑馆，改良蚕种及收贮桑叶方法；3. 令原有之丝业研究所研究对外直接推销手段。^③

四、发展运输，包括江道运输、海道运输、铁路运输。他特别强调，必须扭转以往华商货运依赖和受制于洋商货栈的状况，建议华商各业先以集股方式设立公共货仓。宋子文指出：“仓库一项，为输出入之补助机关，亦为金融界之附属营业。各商除自设货仓外，均恃沙面洋栈为存储货物之所，非但利权外溢，且于商业为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9页。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5～1156页。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6页。

洋商所把持操纵，初非计之得者。”故此，宋子文提议发起公共货仓，依照有限公司组织，由商界集股开办，推举有经验者数人共同管理。^①

五、保护、促进本国工艺出品。宋认为可采取下列措施：1. 设立商品陈列所；2. 定期评审优劣，研究改良；3. 提倡专利；4. 奖励发明；5. 登记商标，“以保其权利，促其精进”。^②

此外，宋子文在《商务行政报告书》中，还提到了消费合作、保险、货币、汇兑、修正公司条例及其他商务行政规章、制订颁行划一之权度并定期检查、普及商业注册、取缔经纪交易等方面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促进广东工商实业具有重要作用。

1925年9月下旬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一度仍兼任商务厅长。此后他在公开的场合虽然较多谈论财政问题，但仍不时地强调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提出：“现在本省之军事已告结束，建设事业实宜起始。”他谈到，国民政府将“从事于国家之伟大经济之建设”，如建筑黄埔商港，“此计划完成之后，广东能由香港手中取回对外商业之权衡；如广东能由香港手中取回其商业赢余之半数，则以商港每年之入款，当有一万万五千万元，建筑商港计划之关于国家及民生之福利，实至巨且大。”^③当年5月，宋子文又在《发行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奖公债告民众书》中，进一步指出：“现国民政府系与人民合作之政府，鉴于民生疲敝，实业不振，非急规定以兴办各种实业，则不足以资御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挽国家于危亡。”他还把兴办各种实业，称作为“谋国民之利益”和“开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7页。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159页。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1日。

国家永久之财源”。^①

当然，由于广东时期军事行动频仍，应付军事需要成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谈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强调经济建设要服务于军事、带有相当的“战时经济”色彩。另外，宋子文在论述发展工商实业的时候，涉及的大多为广东一地的问题，学理性也较差，因而其结论的普遍性意义也就较小。当时国民政府实质上还只是地方性政权，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军事和政治，在经济领域中难免持急功近利的立场。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宋子文思考经济问题时的视界。

1928年1月起，宋子文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更为频繁和紧迫的筹款压力下，他对发展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了深化。同年6月，他发起并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这充分体现了宋子文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他在向国民党中央当局报告召集全国经济会议的缘起时，作了以下的说明：“财政为国家命脉，而整理财政，尤应注重国民之经济。现在北伐完成，财政得告统一，凡百建设，必须通盘筹划，积极措施。”^②在全国经济会议期间，宋子文一方面肯定了北伐军事的合理性，称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无论国家经济，社会经济，皆处于枯窘之地。国民政府之所以奋起义师，无非为人民谋幸福，将出诸水火而登诸衽席。”另一方面，他又着重强调了北伐完成之后，必须迅速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指出：“（北伐）用兵之际，不能无所破坏；破坏之后，亟宜尽力建设耳。非破坏无以涤旧腐，非建设无以畅新机。所谓建设者，苟非于经济上先立基础，则徒托空言，无裨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5日。

^② 宋子文：《财政报1928年6月份工作报告》，引自《财政公报》，第18期，第82页，1929年2月1日。

事实。”^① 他的结论是：“北伐成功以后，国民革命工作完成迨半，建设工作，应即自此而起。”^② 宋子文在经济会议上的某些提案，也体现出了“军事结束，建设开始”的观点，例如，他提出应改良内外债信用，“以资筹款为建设之用”；提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商业及相连各种问题；认为应把“无用之款移用于生产企业，并实行中山建设计划”。^③

同年7月上旬，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在代表财政部所提出的施政大纲中，提出了与“财政政策”并重的“经济政策”。该经济政策部分包含了以下与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内容：

一、扩充陆海空交通，包括整理铁路、推广航业、改良邮电。

二、实行兵工建设，军事底定后着手裁兵，即以被裁之兵，从事水利、道路、屯垦等建设事业。

三、保护贸易，包括：1. 实行保护贸易制度，订定奖励出产品办法；2. 颁定贸易合作办法，统一对外贸易。3. 在通商口岸设局管理。

四、发展生产。包括7个方面：1. 铁矿国有；2. 对煤、油矿、及各特种矿，根据情况分别实行国有、社会公有和商办；3. 奖励制造矿业机械，及设立各种金属冶矿机厂；4. 实行提倡渔业政策，以发展全国水产之利；5. 实行提倡森林政策，以发展全国材木之用；6. 督促全国，厉行畜牧事业；7. 振兴全国农田水利。^④

①③ 《国闻周报》，第5卷，第24期，1928年6月24日。

② 宋子文：《在全国经济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1928年6月20日），《申报》，1928年6月21日。

④ 宋子文：《财政部施政大纲》（1928年7月11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8期，1928年7月22日。